

自由国际主义还是“超国家卡特尔”

——批判性国际秩序观的回音

银培菽*

【内容提要】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的国际秩序遭遇了重大冲击。原来突出开放包容、制度扩散的秩序思想,变为强调提高“准入门槛”和强化身份边界。现有文献以“小多边主义”或“逆全球化”等概念来阐释这些现象,其底层逻辑仍是注解型理论的伸展或坍缩。自由国际主义是一种融合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广谱性理论,在美国学术界的发展下为国际秩序现状起到注解和修正的作用,它认为当前国际秩序是权力和制度的理性混合结果。本文综述了一系列非美国左翼学者代际积累后形成的一种“批判型理论”,透过“超国家卡特尔”概念来理解 20 世纪以来的国际秩序。该理论认为,现存国际秩序是显性和隐性要素分配下的结构,显性要素是国家在全球经济分配和军事实力中所处的位次,隐性要素是国家基于种族和共同经历而相互赋予的身份。两种要素分配中共属于顶层的国家形成“超国家卡特尔”联盟,它们将携手保护现有等级制的纯粹性。“超国家卡特尔”预言了现有国际秩序并不容易在经济和政治的高度发展下走向平等和包容,它将持续维护一种以财富、种族和共同经历为基础的国家间等级制。

【关键词】 自由国际主义,批判型理论,国际秩序,超国家卡特尔

【Abstract】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domina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World War II has experienced significant changes. Initially characterized by openness, inclusiveness, and the diffusion of institutions, this order is now shifting towards stronger entry thresholds and identity boundaries. Scholars describe these changes using terms like “mini-multilateralism” and “anti-globalization,” which are linked to legitimization theory.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a theory that blends realism and liberalism, is popular among American academics and plays a key role in legitimizing and revising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It posits that the order is a rational combination of power and institutions. This article reviews “critical theories” developed by new-generation left-wing scholar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 who argue that the 20th-century international order is characterized by a “supranational cartel.” This cartel is structured by both explicit elements, such as countries’ rankings in glob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and implicit elements, such as the identities countries assign to each other based on ethnicity and shared experiences. Countries that rank high in either element collaborate to form alliances to maintain their privileges in the global hierarchy. This “supranational cartel” hinders the development of an equal and inclusive international order, perpetuating a hierarchy based on wealth, ethnicity, and shared experiences.

【Key Words】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critical theory, international order, supranational cartels

* 银培菽,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青年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6 年,英国完成“脱欧”,美国则在特朗普的领导下退出多边主义机制。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经历了“大变局”——从原来呼吁开放包容、制度扩散(institution diffusion),变为强调“准入门槛”、强化成员国资格的边界性。值得关注的是,这种“门槛”的标准并非简单的军事或经济实力,因为中国和俄罗斯被排除在外,也并非“民主”价值观,因为大量使用民主政体的南方国家也被排除在外。在这些现象面前,美国官方意识形态的自由国际主义理论显得越来越苍白。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2020 年出版的新著《一个民主的安全世界:自由国际主义与全球秩序的危机》尝试回应危机。时任美国副总统乔·拜登在奥巴马任期的最后几天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捍卫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危机是“注解型理论”(problem-solving theory)内在的困境,因为它谋求在既定的前提条件下,为现实问题寻找功能性的解释,对现状起到注解和修正的作用。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善意的霸权”,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历史情境下的功能性产物。本体论的改变将动摇认识论的基础——当美国的国家实力与意愿不再支持为国际社会提供善意的公共物品时,注解型理论的解释力会极大衰减。

本文综述了一系列非美国左翼学者的理论,提出了“超国家卡特尔”概念。超国家卡特尔并非单一理论,而是来自大西洋国家的左翼学者经过几代的发展,逐渐形成的理论集合。在认识论中,这些理论属于“批判型理论”,也就是对现状进行解构和批判,寻找历史情境下的原因,并指出未来可能的变化方向。在美国霸权稳定、“注解型理论”繁荣的时期,“批判型理论”被相应冷落。然而,早在伊肯伯里等学者对自由国际秩序危机进行辩护性解释之前,大西洋国家的一系列左翼学者已经指出这个秩序注定的危机——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主导的世界秩序是一种以阶层、种族和意识形态为基础的“超国家卡特尔”。它不仅对秩序本身的危机提供结构性的阐释,也对目前理解西方的“白人至上主义”等中观社会现象具有启发意义。

一、注解型理论:自由国际主义

“秩序”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是指在体系层次存在的有意设计的、较为

稳定的关系属性。自由国际主义是一种糅合了现实主义的权力观与自由主义制度观的“广谱性”(broad-spectrum)理论,它认为秩序的基础是两种矛盾性的基本元素——权力,以及对社会的合理性设想(legitimate social purpose),二者糅合使得无政府的国际体系可以存在某种政治权威。^①自由国际主义理论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事实上的国际秩序的阐释和注解——一方面,民主国家利用援助和贸易来加强彼此之间的联系,创造一个由贸易、货币和国际组织束缚在一起的世界;另一方面,富裕北方国家“指导”和干预落后南方国家的剧目反复上演,即便在联合国确立了主权平等的多边主义原则之后,主要的区别也只是秩序中的“火车头”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

自由国际主义理论并非一蹴而就。一百多年以来,国际关系学科以自由主义理论和现实主义理论的争鸣为线索向前发展。20世纪70年代,两大理论终于出现合流趋势,形成了自由主义略占上风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自由国际主义之所以带有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注解”功能,是因为它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起到了“大综合”的作用。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有诸多共通之处。二者共享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假设,都将国家视为主要行为体,都采取理性主义路径,以及都认为霸权国对规则创制有决定性影响。现实主义认为制度根本上受权力支配,且制度深刻依附于霸权。但是自由主义在承认制度衍生于权力优势之外,对霸权之后的制度存续怀有更大的信心。因此,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对于美国作为现有世界秩序的创造者和既得利益者,可以通过维护现有的制度体系持续获利这一事实是存在基本共识的。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在理论发展早期是有较大差异的。为了实现霸权统治,权力的投射、经济的支配地位、制度和文化影响力这几个因素到底应当如何组合和排序?现实主义者通常将权力简化为物质实力,认为支撑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是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Wohlfort)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军事实力形容为:“历史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体系,都未出现这样的优势(pre-

^① J.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gimes, transactions, and change: embedded liberalism in the postwar economic ord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6:2, 1982, p.380.

ponderance)。”^①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也从数据上肯定了这一说法。^②相比之下,自由主义者区分了“硬权力”和“软权力”,他们认为,现实主义所强调的硬权力本身并不会决定政治结果,而是需要与软权力配合使用。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提出的自由制度主义与霸权稳定论有密切关系,甚至在作为第三者的建构主义者看来,自由制度主义是霸权稳定论的改进版。^③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论”及其导致军事冲突的预言渐渐不能贴近当前的政治现实,合作逻辑和道德话语日益进入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处方当中。新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霸权合作论”勾勒的图景成为战后国际关系理论的“最大公约数”。

自由主义在与现实主义的对话过程中不仅理论的包容性和延展性不断扩大,还逐渐具有为美国的霸权国角色进行“辩护”的功能,特别是在解释美国霸权与战后国际秩序方面,可以看到在自由主义的许多论断中都有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论”的影子。越到 20 世纪末期,自由主义越是兼容强调实力的现实主义元素与重视规则制度的自由主义元素。在经历多次学术辩论并见证美国单极霸权的“稳定”后,两对理论在前提、对制度的强调以及对霸权国的角色上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共识。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威廉·沃尔福思和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于 2012 年与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约翰·伊肯伯里在《国际安全》上合作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美国的霸权领导是良性的,原因是它为美国及其合作伙伴提供了高于他们所付成本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包括“减少交易成本、建立可靠的承诺、促进集体行动、加强联络与监测”。他们认为霸权产出了许多公共产品,尤其是系统的稳定性,尽管他们承认,美国从霸权地位中不成比例地获得了超额的收益。^④

①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② Robert Jervis, “The Remaking of a Unipolar World,” *Washington Quarterly* 29, No.3, 2006, pp.7—19.

③ 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American World Order*, Polity Press, 2014, p.34.

④ Stephen G. Brooks, G. John Ikenberry,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Don’t Come Home, America: The Case against Retrenchmen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7, No.3, 2012, pp.7—51.

自由国际主义成为指导美国对外战略实践的官方意识形态以后,进一步容纳了越来越多的现实主义理论元素,成为一种“广谱性”的自由主义形式。这种理论综合在华盛顿政策机构产出的意识形态中以“美国利益”的形式输出。在政策实践中,自由主义对权力的认知在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据了上风。权力转化为影响力的机制是间接的和复杂的,尽管现实主义强调物质能力是权力的主要来源,但对于如何开发和使用能力的论述却相对不足。早期现实主义的论述曾经对权力的复杂性进行细致入微的描述。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认为权力包括了物质基础、民族性格、公众道德和领导品质。但20世纪后期兴起的结构现实主义对权力进行了“简化”处理,主动忽视了权力“转化”为影响力的过程。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甚至认为,权力与影响力不存在区别,前者只是产生了后者。^①自由主义者则不同,他们强调权力的不同形式与转化为影响力的途径。约瑟夫·奈将权力按照行使方式分为三类:通过恫吓或胁迫实现的军事权力,通过引诱或惩罚实现的经济权力,以及通过吸引、说服和议程设置实现的“软实力”。软实力概念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风靡全球的理论,并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深刻影响。

美国的外交战略也体现出这种糅合性:自由主义作为美国官方的外交大战略,被用于G7国家盟友之间,而现实主义则是美国外交在中东、亚太和拉丁美洲等区域的实际行动指南。尽管自特朗普执政之后,关于自由国际主义被严重破坏的哀鸣常在,但是拜登上台和多边主义复苏的迹象,充分证明了自由国际主义作为美国外交大战略理论的韧性。作为最受美国外交建制派承认的“正统理论”,自由国际主义呈现“自由为体,现实为用”的特征,充分保留了它“解决问题”的功能主义属性。

作为统合了国际关系理论两大主流范式的代表性理论,自由国际主义理论一向以美国霸权的最佳注解出现。自由国际主义兼容了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形成了以“道德与合作”结合“武力与威慑”的手段来维护美国霸权的共识。因此,这一理论的“反面”便不再是现实主义。事实上,这一理论的“阴影”和美国的霸权面临的挑战一样,越来越来自霸权的“内部”,而非美国一直在寻找的“他者”。伴随着经济增长周期的退潮与金

^①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aveland Press, 2010.

融泡沫的破灭、全球化深入对美国经济结构的反噬、自由多元主义呈现僵化政治教条的颓势、右翼民粹主义被反复鼓噪和煽动,有关美国国内社会经济因素与美国霸权的关联的讨论不断产生。

二、批判型理论:超国家卡特尔

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进行反思和解构的批判理论在 20 世纪后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陷入低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中,以美国为核心的北方国家集团引领了工业化、现代化和全球化发展。国际关系学科的中心也转移到美国,马克思主义在美国的左翼国际关系理论中也是“边缘中的边缘”。在美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已死”成为 20 世纪一种流行的说法。^①然而,在大西洋国家内部,批判理论仍作为一股潜流长期存在,并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马克思主义。例如,“伯明翰学派”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左右引领了英国文论的“葛兰西转向”,成为继文化主义、结构主义之后的第三次范式转换。^②大约在同一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英国学派”兴起,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将葛兰西实践哲学思想运用到国际关系分析中。英德杰特·帕马(Inderjeet Parmar)是英国国际关系学会(British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的前任主席,他从马克思主义中寻找理解当代国际秩序的理论工具,并与美国的主流自由主义学者约翰·伊肯伯里、约瑟夫·奈等产生了理论对话。

“超国家卡特尔”是本文对一系列大西洋国家左翼学者关于 20 世纪以来的国际秩序的思想的概括。卡特尔在经济学中指正式或非正式的企业或组织达成同意,合作控制和操纵特定的市场或行业,是一种物质利益结构。在国际关系视角下,卡特尔不只是一种物质结构,也是一种文化结构、制度结构,发生在这些结构中占据等级制高位的国家之间。本文将先回顾注解型理论“自由国际主义”对战后世界秩序的理解,再回顾跨大西洋两岸的非美国学者对国际秩序及其注解型理论的批判。

^① Ronald Aronson, *After Marxism* New York: Guildford Press, 1995, p.1.

^② 白云真:《新葛兰西学派及其批评》,《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2 期。

（一）思想源流：意大利的葛兰西

与自由国际主义相比，马克思主义是典型的批判型理论。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国际秩序的讨论集中在物质层面。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上层建筑的关注奠定了他国家和国际关系的理论出发点，他的霸权（领导权）概念不仅扩展到了国际领域，也影响了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国家、国际关系的论述基本是从“物质一元论”出发的，认为国际关系的发展动力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占有形式的不断变化。马列主义关注资本主义在膨胀的过程中如何将国内阶级关系扩展为帝国主义国际体系。^①从葛兰西开始的新马克思主义更加关注上层建筑，他建立的“实践一元论”强调主观与客观、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在实践中的统一。

葛兰西提出了一个经典设问：是国际关系为第一位，还是基本的社会关系为第一位？他给出的回答是，社会关系毫无疑问位于国际关系之前。^②他的“社会关系”指的是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总称，不仅包含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也包括存在于人们精神层面的制度、道德和价值观。葛兰西主义是西方马克思学说的一个分水岭，是其理论重点从经济层面转向上层建筑、从历史转向现实的标志。^③

葛兰西对上层建筑的关注始于他从比较政治的角度对俄国和意大利革命的观察。从1917年到1921年间发生的革命起义中可以发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大多失败了，而俄国作为一个远未达到马克思预想中的革命先决条件的落后工业化国家，却成功发动了布尔什维克革命。葛兰西认为，俄国的上层建筑发育不良，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的危机，使得布尔什维克们无需在上层建筑斗争中花费太多精力，偶然促成了俄国革命的胜利。上层建筑是任何试图争取统治地位的集团的重要斗争目标之一，他们需要在意识形态上同化或者征服旧的上层建筑

① 花勇：《国际社会的交往构成——交往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国际观察》2014年第5期。

②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9页。

③ 袁银传、杨乐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及其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里的传统知识分子。^①俄国的革命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是难以复制的,因为那些社会的上层建筑中有一大批复杂的政治团体和制度。革命若要取得胜利,必须先使这些“中间机构”摆脱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葛兰西在 1924 年总结说:“类似俄国这样直接攻击国家机关的革命不会在意大利发生,意大利革命政党需要采用比布尔什维克们更长远的策略。”^②

上层建筑由此成为葛兰西实践哲学关注的重点(见图 1)。他重申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观点:人在把自己的想法化为现实的实践活动时,总是受到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旧的意识形态,或由统治阶级塑造的社会通行的意识形态的钳制。^③葛兰西在此之上进一步指出,思想意识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应该割裂开来看待,二者在历史情境里总是处于反复的互动当中,彼此之间是“辩证的”或“自反的”关系,不断互相影响,无法假设谁具有完全的决定性。在葛兰西看来,上层建筑有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所说的“相对独立性”。^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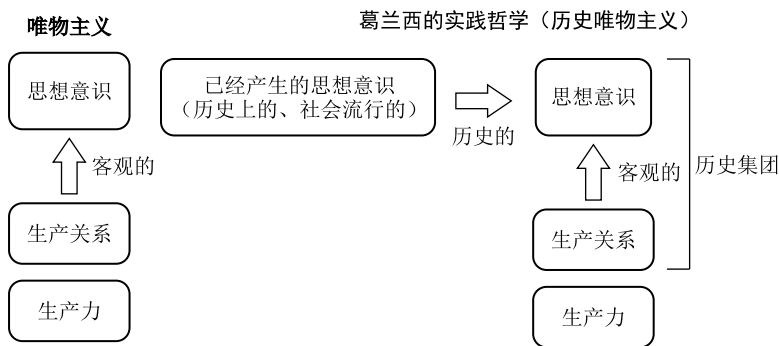


图 1 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与唯物主义的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旻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 页。

② Steven J. Jones, *Antonio Gramsci*, London: Routledge, 2006, p.31.

③ [德]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83 页。

④ Steven J. Jones, *Antonio Gramsci*, p.34.

葛兰西将上层建筑的结构分为两个部分：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指一切强制性力量的装置，它直接控制物质基础；“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包括一切私人的有机组织的总和，如教堂、教育制度、运动队、媒体和家庭等，它对意识形态进行规训和引导。任何一个社会集团要想取得统治地位，都要同时得到“政治社会”中的主导权(dominance)和“市民社会”中的智识与道德霸权(intellectual and moral hegemony)。①国家是“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总和。葛兰西驳斥了国家只有“守夜人”和“警察”这种最低限度功能的说法，认为私人力量、市民社会也是“国家本身”。②甚至“霸权”(hegemony)一词在他的语境里是专指市民社会中的领导权(文化霸权)，与现代政治中具有强制性统治色彩的霸权概念相去甚远，指的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统合与领导能力。因此，任何社会集团要想领导广义上的国家，需要同时控制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这被葛兰西具象化为对“政治社会+市民社会”的控制权，也就是坚硬的武力与柔软的领导力的统一。

一个国家的某个社会集团夺得了统治权，意味着“历史集团”(historic bloc)在社会结构中形成，它包括两个统一：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领导阶级自身与从属阶级的统一。③完成这两个统一需要领导阶级广泛吸收敌对性、中立性的社会集团的知识分子，形成一个代表广泛阶级利益的精英联盟，其中的关键是争取“有机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虽然属于市民社会，但是他们渗透在资本主义生产与管理的各个环节，保持与所有社会阶层的联系。如果有有机知识分子可以和领导集团保持一致，就能发挥“组织和联接”的职能，一方面同生产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引导民众的思想

①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跃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9页。

② 葛兰西在这里比较了多种国家功能的理论。第一种是拉萨尔的“守夜人”或“作为警察的国家”，指的是国家的职能仅限于保卫治安、维护法律；第二种是黑格尔的“伦理国家”，指的是世俗国家的道德和教化功能区别于中世纪的宗教教会统治；第三种是俾斯麦的“干涉主义”国家，指的是国家在经济上实行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政策的功能。葛兰西认为，现实中的国家功能是这几种功能的灵活组合，但是他强调，国家一定包含市民社会，甚至随着市民社会治理有方的要素越来越明显，不难想象，国家的强制性要素会逐渐消失。[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跃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1—342页。

③ 张建新：《激进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页。

从技术工作层面升华到人文历史层面,通过市民社会中的习惯、思想、道德等内容,来潜移默化地改变人们对政治的看法。^①在有机知识分子的作用下,建立历史集团的过程有时是以“开明的形式和手段”来完成的。但是,当被统治群体的“同意”没有在有机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在规定时期塑造完成,或者原有的社会共识崩溃了,就需要借助“政治社会”来强制发挥“规训”的功能。因此,葛兰西认为现代政党应该像马基雅维利形容下的古代君主一样,既要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武力,也要利用公众的普遍信念和同情,获得大多数民众对政权的同意、服从和忠诚,建立智识上的领导权,也就是所谓的“文化霸权”。

葛兰西用“局势分析”(analysis of situation)来形容国内政治在国际层次上的拓展。霸权在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中的统一,既适用于国内社会结构,也适用于国际社会结构。因为“力量关系”(relation of forces)不仅存在于国内,也存在于国际,国内社会结构的改变将有机地改变国际关系。政治科学的任务包括对不同层次的力量关系进行“局势分析”:在国内层次,力量关系表现为生产力水平、政治力量和政党霸权的关系;在国际层次,力量关系表现为大国、霸权性国际体系、小国的独立和主权等。国际层次的局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内层次的局势,例如当一个国家直接的经济生活越是隶属于国际政治,国内党派就越能利用这种局势来与其他政党竞争。^②世界霸权的建立(或世界历史集团的形成),既需要领导国家保持对次级国家经济和军事上的统治,也需要对这些国家的上层建筑进行控制,并且要在意识形态上与次级国家的领导阶级保持“有机的联系”。这种有机联系主要依靠领导国家对次级国家有机知识分子的“文化霸权”来实现,并不是通过武力优势就可以直接实现的。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和对国际关系的局势分析,在当时是超时代性的,体现了“体系—单元”联动的层次思考,强调了政治、经济与文化三种权力的一体性。关于“体系—单元”联动,20世纪60年代的结构现实主

^① Steven J. Jones, *Antonio Gramsci*, pp.60—65.

^②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跖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219页。

义曾提出将体系层次的国际政治与单元层次的外交政策分开研究；但在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现实主义又将国家“找回”，重新架构起二者之间的联系。^①关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文化权力三者的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在20世纪70年代架起了世界政治研究与世界经济研究之间的桥梁，而新自由主义则让文化权力正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关键要素。^②这些后来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都印证了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所提出的国内—国际力量关系“局势分析”的正确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下，新葛兰西主义理论家发现资本从19世纪进化到20世纪后，不仅能娴熟地分化和拉拢(co-opt)国内的异见群体，还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体系当中建立起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制度。

葛兰西的历史集团理论能很好地把握美国霸权的“对内”特征。在葛兰西的经典理论中，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资本主义大国，其内外政策目标不外乎是追求统治阶级或精英群体的利益。这些利益可能分散在各种不同的场域，或私人场域(公司利益)，或公共场域(社会利益)，或国家场域(政府利益)。不同场域的统治阶级会在具体历史条件下结盟，形成利益合流的历史集团。历史集团是一种“国家—社会复合体”(state-social complex)，使用说服与强制结合的方法来维持霸权。

(二) 理论发展：加拿大的考克斯与吉尔

葛兰西的“历史结构主义”被加拿大学者罗伯特·考克斯、斯蒂芬·吉尔(Stephen Gill)沿用，他们提出一种综合物质(经济+政治)与意识，国内、国家与国际层次的结构主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也有国际主义，但以还原主义(reductionism)为主，省略了国内层次的丰富内容。而历史结构主义认为，历史集团的力量关系在国内和国际层次上是相似的。在历史结构主义视角下，国际关系不是国家间的权力关系，而是“联系不同国

^① 关于结构现实主义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参见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aveland Press, 2010；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論构建与经验拓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

^② 关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参见 Joan Spero,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lations*, St. Martin's Press, 1985, Third Edition；Susan Strange, *The Retreat of The State: The Diffusion Of Power in The World Econom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关于新自由主义，参见 Joseph Nye, *Soft Power*, Taylor & Francis eBooks。

家社会基础的国际社会关系的联合体”。^①

考克斯概括了历史结构中三种相互作用的力量：物质权力、观念和制度，这三种力量循环影响，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机制（见图 2）。物质实力是经济性的，包括生产关系及其衍生的权力，观念是意识性的，包括主体间认知和社会群体性认知，而制度是物质实力和观念的组合方式。这三种力量以特定的“历史结构”形成了历史集团。这种提法实际上是对葛兰西历史集团概念的具象化，即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历史集团。^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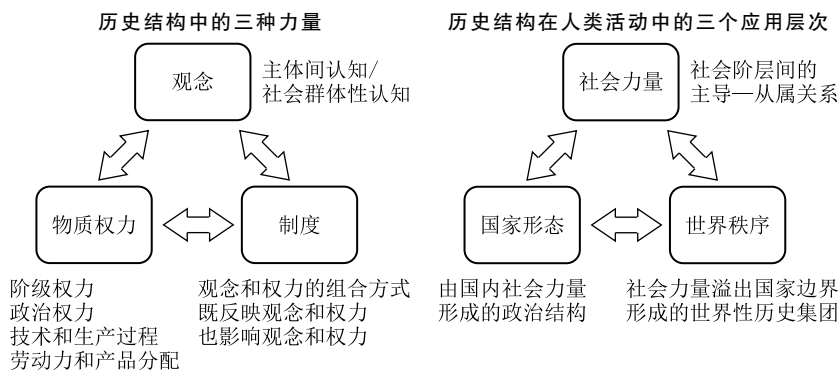


图 2 考克斯的历史结构理论

资料来源：Robert W. Cox,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 Vol.10, No.2, 1981, pp.126—155。

这三种力量形成的历史结构又在人类活动中表现为三个层次：“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彼此之间也可以循环影响。社会力量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不同阶级和群体之间的“主导—从属”关系；国家形态则是由国内社会力量之间的这种权力关系决定的政治结果；社会力量不仅存在于国家之内，也溢出国家边界，形成跨国的历史集团，也就是世界秩序。人类在顺应和抵制所处的历史结构的过程中，从压力和碰撞中产生替代性的新历史集团。这样的过程在人类活动的三

^{①②} Robert W. Cox,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Millennium*, Vol.12, No.2, 1983.

个层次上都会上演。在这三个层次中,考克斯认为社会力量是世界秩序的基础,国家在世界结构和国内社会力量之间,扮演着一种具有中介性质但又独立的角色,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国内社会的力量关系在国际体系的外化表现。

考克斯指出,鉴于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指的是智识和道德上的领导性,霸权性世界秩序绝不是帝国主义的剥削秩序,而是即便体系中存在霸权国家,其余国家之间也能利益兼容,并认可霸权国家的世界秩序。这种世界秩序必然不仅是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是跨国的经济体、政治体与社会体之间的有机联系。霸权国是在政治、经济、技术和文化等方面完成先进革命的国家,这些信息传播至外围国家,引起跨国社会层面的模仿和学习。即使是与霸权国发展路径完全不同的外围国家,也可能尝试在不破除旧的发展模式基础上,引入霸权国的部分做法和经验,形成外围地区的“被动革命”(passive revolution)。^①霸权是主导性社会集团在生产方式、意识形态及两者的结合方式上都居于统治地位的一种状态,表现为对政治社会(正式国家机器)和市民社会(私人社会组织)的同时掌控。当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具有这种状态,这个国家就成为霸权国家。

吉尔结合建构主义的视角,认为权力和霸权都应在两个层面上理解,一个是物质层面,一个是规范层面。^②行为性权力(behavioural power)在物质层面,是指一个行为体能够使另一个行为体以自己倾向的方式行动。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是指一个行为体在物质性权力基础上还形成了规范性意识形态,使另一个行为体“不得不”按照给定的方式行动。全球一体化的市场及其规则就是结构性权力的体现,身处其中的弱势国家不得不遵循市场规则及其对应的意识形态,而输出这种结构性权力的群体就是葛兰西所谓的霸权历史集团。历史集团是指在一段特定时期内,物质力量、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一致性,或者广义上集合不同阶级力量的联盟。历史集团的建立以一套主导的意识形态为基础,这些主导意识形态有时被称为“支配性意识形态”。历史集团的成功必须在政治和经

① Robert W. Cox,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Millennium*, Vol.12, No.2, 1983.

② 白云真:《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跨大西洋分歧》,《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4期。

济上有力量,并有强说服力的想法和论据,在伦理政治层面能够建立和催化一系列政治网络和组织。^①

在吉尔看来,1945年以后形成了一个新的国际性历史集团,以美国为核心,在西方主要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盟”(organic alliance)。这个联盟的主导力量是跨越国界的资产阶级,但同时涵盖了多个阶级的更加“有机”的社会力量,这个联盟既涉及社会的物质性方面,也涉及规范性方面。历史集团的核心并不仅是政府,还是一个由政府及市民社会庇护的跨国公司群体。它们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主导、由西方主要国家推进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鼓励市场开放和资本自由流通,从而在全球扩张的市场中获得结构性权力,并使这种权力以一种“市场文明”的意识形态结构固定下来。^②

(三) 理论融合:英国的帕马

帕马的理论传承了两种理论传统: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和葛兰西—考茨基对霸权的理解。帕马在获得国际政治学博士之前,曾经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社会学专业受训。他的研究方向始终具有英国学派最核心的“国际社会”思想,他聚焦英美外交精英在过去一百年中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以及基金会、智库、研究机构等社会组织对外交政策发挥的作用。一方面,帕马对自由国际主义所注解的美国霸权和世界秩序提出了批判,并与主流学者进行对话和争辩;另一方面,帕马提出了一种结合了葛兰西与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思想的“葛兰西—考茨基”理论框架,以解释当代美国霸权的国内和国际性统治基础。

帕马首先从新葛兰西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的三大缺陷:第一,自由国际主义缺少对美国国内阶级、种族等不平等社会事实的承认。美国的国际战略向来与国内经济社会现实息息相关。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革命以来,民权运动、技术变革和全球产业布局重构共同导致了白人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经济机遇的丧失,使这部分选民投入以低税收和财政保守主义为纲领的共和党阵营。然而,共和党的市场化政策并没有显著改善经济不平等的状况,“铁锈地带”和白人工薪阶层

^{①②} Stephen R. Gill and David Law, “Global Hegemony and the Structural Power of Capital,”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33, No.4, Dec., 1989, pp.475—499.

反而因族裔的多样化而加深了对美国身份的认同焦虑。这些不平等的结果就是 2016 年特朗普的当选,以及他所提出的一个毫不掩饰的保守主义国内政治纲领与一个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美国外交战略。第二,自由国际主义相当推崇民主,但美国国内和国际秩序的建立方式都体现着极强的实用主义、精英主义。在国内,美国于 20 世纪完善的联邦级别国家机构主要由私人精英组织部门推动,克服了当时各自为政的地方利益和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困境。在国际上,美国处理对外关系时并未优先考虑民主,而更关注如何将其他国家的精英驯化进霸权秩序的规范之内。第三,自由国际主义忽视了美国在对外关系中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心态,尤其在处理南方国家和民族的问题上。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提出了国际主义和民族自决原则,却同时拒绝了日本在国际联盟中的种族平等原则提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建立战后秩序的核心思想带有深刻的西方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烙印,但对待其他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真实态度是引导它们保持与 WASP 文化的一致性。此外,对待“非西方”国家的崛起,美国更始终坚持“接触加遏制”,时刻防范“上升力量”成为“反对力量”。这些国际政治现实都与自由国际主义的平等、普遍和包容原则相左,体现了美国霸权明确和隐晦的种族性、殖民性和帝国性特征。^①作为自由国际主义的替代,帕马认为葛兰西与考茨基的思想相结合可以提供一种更客观的美国霸权理论和国际秩序观。^②

帕马认为,自由国际主义秩序本质上是一个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都以社会阶层为基础,精英的霸权地位从美国国内社会延续到国际社会的秩序。而“自由国际主义”或“威尔逊主义”则更多地充当着一种意识形态来合法化美国霸权的现实,并没有从理论角度真实地反映美国领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内涵。一种结合了葛兰西与考茨基的理论框架可以作为对自由国际主义的替代选项——葛兰西主义比自由主义更真实地反映了国内精英的社会化进程,而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理论则比自由国际主义更好地解释了跨国精英联盟的政治现实。

^{①②} Inderjeet Parmar, “The US-Led Liberal Order: Imperialism by Another Nam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4, No.1, 2018.

帕马在葛兰西和考茨基的观点基础上提出,同一社会阶层的利益合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民族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帕马的思想并非全无先例,伊曼约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和威廉·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美国民主化政策的研究都发现了资产阶级跨国结盟的现象。罗宾逊假定存在“一个以世界体系为核心的有阶级意识的跨国精英”,他们在金融资本的霸权下组织起来。民主是实现这种霸权的工具,其内在逻辑也悄然发生变化。在全球化时代,那些在过去被默许存在,甚至是获得支持的非民主政权,已经成为“国际资本积累的新模式”的束缚。而跨国精英阶层,以及其当地盟友会想方设法将非民主国家转变为市场民主国家。在这种视角下,“民主化”依附于全球经济的本质展开,这是对资本新要求的调整过程,它要求开放的社会和国家完全融入国际体系。^①

考茨基的“帝国合作”理论甫一提出,就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遭到否定。然而,当前的多边主义进程和区域一体化都不同程度上印证了考茨基在一个世纪之前被遗忘的观点。欧盟、七国集团、北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似乎在提醒着人们,考茨基的观点适用于 1945 年以后的世界,资本主义跨国联盟在超国家层面、军事领域和经济领域以不同形式生成。帕马认为,考茨基的观点可以在两个方面帮助理解美国领导下的战后秩序:第一,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尽管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与紧张,但战争并非不可避免,这也是自由国际主义中的相互依赖理论所推断的。第二,资本主义国家的终极追求是联合其他国家精英,在国内和国外共同扩展他们的权力。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要与其他国家已经掌握权力的精英建立联盟,或者在权力真空的国家培养和扶持新的精英。总之,考茨基的理论同时批判了列宁主义、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观点——国际秩序确实是帝国主义的,但并不一定会导致战争,也不是善意的或“被邀请的”,而是一种高社会阶级之间的跨国政治合作,这种合作凭借不稳定的社会和政治基础得以生成,以达到追求共同利益的目的。

^① William I. Robinson, *Promoting Polyarchy: Globalization, US Intervention, and Hegemo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33—37.

三、注解与批判之间：比较两种秩序观

综上所述，葛兰西用结构视角来分析国内社会，指出秩序是某一历史条件下在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中同时生成的结构。考克斯从葛兰西的“历史结构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国内秩序和国际秩序一样，是物质、观念与制度三者历史性生成的结构。吉尔更具象化地将历史结构视角应用于现实世界，指出西方国家在1945年以后历史性形成了“有机联盟”，不仅在政治和经济上统治了其余国家，也在伦理政治层面为现状进行辩护。帕马从葛兰西主义视角提出对自由国际主义缺陷的批判，并认为考茨基的“帝国合作”理论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检验下失败了，却对国际秩序现状具有解释力。

美国战后七十年中的国际秩序，是自由国际主义体系，还是超国家卡特尔？二者的根本区别是进入秩序的“门槛”，前者认为进入秩序的门槛是国家对规则的接受和执行程度，而后者认为是国家在财富、权力、种族和共同历史上相似的等级(hierarchy)位阶。自由国际主义从理性角度来解释美国为何不在秩序中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根据自由国际主义，规则在不同区域的适用效率(制度因素)和回报(权力因素)都有差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早期不在亚洲成立北约这样的多边主义安全组织，是因为美国与亚洲国家之间的权力不对称性过大，多边主义路径会让这些成员国“搭便车”，而且并不能显著提升美国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能力。^①美国支持在欧洲建立多边主义机制，并将自身的经济与安全承诺纳入这些机制当中。反观亚洲，美国的核心需求是保障军事基地，并不愿意与亚洲国家在多边协议中缠夹不清。在与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地区和国家交往时，美国完全凭借权力地位来对这些国家进行命令、胁迫或“教育”，直接与其国内精英达成不对等的“庇护—回报”协议。^②

^① Donald Crone, “Does Hegemony Matter? The Reorganization of the Pacific Political Economy”, *World Politics*, Vol.45, No.4, 1993, pp.501—525.

^② 银培菘：《暗金政治：慈善基金会与美国霸权》，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31页。

而超国家卡特尔理论认为,国家结为卡特尔除了依据财富和权力标准以外,同样重要的是在种族、宗教、共同经历上具有相似认同。资产阶级的跨国利益是北方发达国家之间达成卡特尔的显性要素,而隐性要素是在长期的社会化中形成的优越性认同,这种认同更复杂和非理性,但其影响力会在显性因素退化的时候更加凸显。例如,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基于国家利益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不愿意介入复杂的欧洲事务。这种局面的改变在迈克尔·亨特(Michael Hunt)看来,与美国掌管外交事务的早期精英集团三种共同经历有关:第一,都通过赴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旅行促进了对外交事务的非正式教育;第二,在进入政府之前都曾在公司任职;第三,对外交政策的观念是在精英社交圈、高层次的课程项目和外交事务俱乐部的价值框架下形成的。这三种经历分别从不同方面增强了这些精英的国际主义倾向:赴欧洲的旅行能为看待国际事务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也加深了对欧洲地缘政治利益的正确判断,有助于克服“卷入欧洲复杂事务”的孤立主义思维惯性;在企业界的任职经历能增进对美国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关系的了解,认识到参与世界事务能为美国带来的实际经济红利;在与国际关系有关的学术、政策和教育类社会网络中获得的知识能直接提供他们在外交事务上的“行动路线图”。^①

四、结 论

本文回顾了在美国之外的大西洋国家中一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左翼学者思想。在自由国际主义理论的繁荣期,批判型理论受“马克思主义已死”的论调遮蔽。在与美国的政策实践反复磨合中,自由国际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美国外交的“官方意识形态”,为该理论作出贡献的也主要是美国的学术精英。自由国际主义融合了现实和理想两种传统,是一种“广谱性”理论,发挥着注解和阐释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的功能。

^①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in Twentieth-Century Foreign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137.

“超国家卡特尔”是对上述大西洋国家左翼学者理论的概念化,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物质权力、观念与制度三种结构中占据优势的国家结成的“卡特尔”。“超国家卡特尔”概念可以追溯至 20 世纪初的葛兰西与考茨基,但是历史结构主义思想是在代际积累后才发展为应用性较强的国际秩序观。超国家卡特尔的物质结构是全球化资本主义市场;观念结构是政治思想、种族、宗教及共同经历;制度基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形成的一系列军事、政治、金融等国际机制。许多类似的概念往往仅捕捉到国际秩序的某一种结构,或是暂时形成的、无历史性的结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被描述为全球性“信用卡特尔”,它概括了物质、制度两种结构。^①又如,安德鲁·巴塞维奇(Andrew Bacevich)认为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结成的包括相近意识形态国家和文化知识分子形成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卡特尔”(Pax American cartel),它包括了物质、观念的结构,却是一种短暂的权宜联盟,不意指历史性形成的秩序结构。^②

“超国家卡特尔”预言了现有国际秩序并不容易在经济和政治的高度发展下走向平等和包容,而是会持续维护一种以财富、种族和共同经历为基础的国家间等级制。这种预言在 20 世纪初并没有得到现实经验的反馈,却在近年的全球性现实中获得了强烈的理论“回音”。过去七十多年里,繁荣发展的自由国际主义强调“基于规则的制度”,淡化了秩序结构中基于种族、宗教、文化的观念结构。“超国家卡特尔”认为,国际秩序的基础不仅有物质、制度,还有观念。原本在卡特尔中充当认同基础的宗教和科学文化的结构都不如战后初期稳定——宗教在全世界范围内呈现多元化趋势;在教育发展和开放移民政策下,知识分子社群也变得全球化,发达国家中移民可以获得与人口不成比例的教育机会。随着危机感的迫近,卡特尔国家中的受益者还能用什么来维系观念结构中的优越性呢?种族成为“超国家卡特尔”在观念结构中捍卫自身优势认同的堡垒。“白人至上主义”是这种背景下的历史性产物,它突出显示了国内社会结构与国际社会结构的不一致性——白人至上主义运动的发起者在国内属于蓝领阶

^① Bird, Graham. 2001. “IMF Programs: Do They Work? Can They be Made to Work Better?” *World Development*, 29(11):1849—1865.

^② Andrew J. Bacevich, “Washington’s Pax Americana Cartel,” *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 May 13, 2018.

层,但他们的目标是捍卫本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所谓“优先”地位,因为过去是这种优先地位使得他们普遍成为受惠者。而当下的全球化贸易、金融甚至数字相互依赖结构,越来越使国内精英阶层在全球范围内分摊成本,而让普通中下阶层承担后果。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超国家卡特尔”中的“白人至上主义者”是国内的“民粹主义者”,却是国际秩序中的“帝国主义者”。令人怀念的并非只是某种种族结构,而是支撑帝国的权力结构和在国内社会相对均匀地分配“帝国红利”的制度结构。